

丁石庆 主编

社区语言与家庭语言

北京少数民族社区及家庭语言调查研究之一

*Community
Language
and Family
Language*

民族出版社

社区语言与家庭语言

北京少数民族社区及家庭语言调查研究之一

丁石庆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区语言与家庭语言: 北京少数民族社区及家庭语言调查研究. 1/ 丁石庆主编.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 - 7 - 105 - 08194 - 3

I. 社… II. 丁… III. 少数民族—民族语—调查研究—北京市
IV. H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8078 号

社区语言与家庭语言

——北京少数民族社区及家庭语言调查研究之一

主 编: 丁石庆

策划编辑: 倩 男

责任编辑: 龚黔兰

责任校对: 郝 杰

责任印制: 石小娟

封面设计: 吾 要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 - 58130038 (编辑室)

010 - 64211734 (发行部)

网 址: www.e56.com.cn

投稿邮箱: gongqianlan@sina.com

排版制作: 北京金若龙文化公司

印 刷: 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0001 - 1500 册

印 张: 10.625

定 价: 2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8194 - 31C · 202 (汉 181)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服务于不同目的和需要，国家机构或某个社会团体组织过许多次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的调查研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56年至1960年，由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那次调查有700多人参加，比较集中地对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和语言结构状况、方言差异状况、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写出了一大批调查报告，为解决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为文字不完备的民族改革或改进文字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57种。其后，对少数民族语言零星的调查研究一直绵延不断。

20世纪80年代中期，根据制定新时期民族语文政策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民委组织了联合课题组，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重点项目，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进行过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调查研究，共调查700多个抽样点，获得了10多万条数据，根据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制定了新时期的民族语文政策（见1991年国务院32号文件），其后出版了一套专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分别于1992年、1993年、1994年出版）和印刷一份内部报告。其后，21世纪初，国家又开展了语言使用的国情调查，其中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情况至今没有公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开展了中国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开始时叫中国空白语言调查研究），这项调查实际上是50年代大调查的延续，有10多所境内外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陆续参加了这项调查研究。此项调查目前仍然在继续进行，它的前期成果



《中国的语言》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最终成果《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也已经出版30多种。

以上这些调查研究项目基本上都是比较宏观的，目的就是希望弄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种语言，它们的使用状况、分布状况如何，特点如何，活力如何，它们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分类表中处于什么位置。遗憾的是由于政治原因，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到台湾岛去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幸好前不久台湾的专家学者也出版了一套《台湾南岛语言丛书》，共13种（还不全），多少弥补了这个缺憾。

最近读到丁石庆先生主编的《社区语言与家庭语言——北京少数民族社区及家庭语言调查研究之一》一书，这也是一部集体调查研究的著作，主要依托在读的博士生、硕士生开展调查研究，以问卷及大量访谈实录为原始依据，完成了多篇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对北京地区的满、回、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彝、白、苗、锡伯等少数民族社区与家庭的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语言态度、族群认同、风俗习惯保持等诸多话题进行了专题问卷调查及访谈，根据问卷调查及访谈笔录整理出大量数据，制作成图表，并依据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有很好的说服力。而且如此从微观的角度以家庭、社区为单位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尚属首次，从问卷的设计到调查研究的方法，都有一些独到之处。因此我个人认为，此项调查研究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值得提倡和发扬。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流动和迁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除了工作调动以外，更多的是商业目的。一些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离开原母语社区，流动到新的环境工作、学习、经商……，当然，他们应该迅速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有的甚至组织新的家庭。但是他们也有权利继续保持和发扬他们原有的生活习惯，他们的语言状况如何，他们的文化生活如何，他们是否能够延续他们原来社区的风俗习惯、语言交际和文化生活，这些问题是否应该有人来关心，来调查研究，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延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丁石庆先生主持的《北京地区少数民族社区与家庭语言情况调查研究》项目，开了这一领域的先河，无论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方面都做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得到了北京市民委相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协助，可以说是初战告捷。我本人对此没有研究，赘上数语，以示祝贺！

孙宏开

序于安贞桥寓所

2006年12月1日

绪 论

引 言

（一）“社区”及“语言社区”的概念

“社区”，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是一个外来词，经学者研究，“社区”一词源于德语（Gemeinschaft），经由英语（Community），进入汉语。关于对社区之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不同国度和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① 德语的“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其涵义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地域共同体，还包括血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英语“社区”的涵义与德语基本一致。20 世纪 30 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类学工作者引入了这个术语，但基于对中国现实社会作实证研究的需要，当时这些学者把社区理解为有边界的相对封闭的实体，社区因之有了地域性的因素，其内涵与德语概念有了一定的偏离。20 世纪 90 年代初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重新提出的社区建设概念，仍强调的是地域界限，即农村的行政村或自然村，城市的街道办事处辖区和新划分的社区委员会辖区，其大致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法定社区”，忽视了社区成员的归属感。而 e 时代出现的虚拟社区则完全是“隐性共同体”，其强调作为“共同体”的社会心理基础而

^① 胡鸿保、姜振华：《从“社区”的语词历程看一个社会学概念内涵的演化》，《学术论坛》，2002（5）。

不关注其地域属性的特点,强调的是人们对社区地域性生活共同体的认识,它没有物理意义上的地域边界,个体可以超越空间的障碍生活在不同的虚拟社区里。于是,迫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社区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①

我们同意以下对社区概念的解释,即:“无论哪一种类的社区,都有一个或清楚或模糊或虚拟的边界。地域性社区的边界相对稳定,精神共同体的边界因成员的增减而扩展或缩小,虚拟社区的边界则变动不居。社区的空间范围亦随之稳定或变化。不同种类社区在空间上或重叠、或部分重叠、交叉,呈复杂的状态。个人与社区的关系也并非只有一种。不论在城镇还是乡村,一个人有多个社区认同的情况并不少见。如一个宗教信徒认同某个宗教社区,他(她)同时还可能认同自己所属的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如果他(她)经常参与某个(或某几个)电子网络群体的讨论,并认同该群体的价值观念,他(她)还是一个或几个虚拟社区的成员。”^② 但为行文方便,本课题仍沿用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概念,即指在一定地域共同生活,具有共同生活方式、风俗、共同意识的人们共同体。但同时,也引入了像单位社区这样的概念,所谓单位社区即指那些由于某种工作关系或工作性质所制约的群体的聚合体。

“语言社区”,又称语言共同体,甘姆勃兹把它定义为任一类人类聚集体,该聚集体通过共同的语词符号达成系列规则并相互频繁影响,由此通过语言应用上的区别和其他类聚体分别开来。^③ 从此可以看出特定的群体基于其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地位在语言的应用上必形成独特的语言社区。

(二) 北京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的特点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首都。全国

① 水镜君:《忆旧共同体与多元社区的建设》*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 2 《青石中州学刊》第2期(总第140期)。

② 同上。

③ 李强:《应用社会学》,19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56个民族都有人在这里生活、工作、学习，是全国民族成分最全的一个城市。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首都北京是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缩影，同时也是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这里聚集着各少数民族的优秀代表人物，他们组成了许多少数民族社区。

由于历史、风俗等原因，北京少数民族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大分散”指全市18个区县都有少数民族居住。“小聚居”指全市少数民族基本都集中在13个街道、5个民族乡、109个民族村中。人口较多的回族和满族各有自己的以街道、乡村为单位的聚居社区。除此之外，还有各少数民族杂居形成的一些社区。少数民族社区中的成员在与本民族的人交谈时一般使用本民族语，在与汉族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交往时一般使用汉语普通话。各少数民族在使用同一种共同交际语——汉语时会或多或少地产生一些不同的语言特点，甚至有鲜明的语言差异。比如，回族在失去民族母语后转用了汉语，但回族所使用的汉语中仍然保留着鲜明的民族语言的文化特色。在语言使用上，各少数民族社区具有蕴涵深厚民族文化特色的语言风格，这些独具民族风格的语言便形成了特殊的北京少数民族语言社区。

（三）本课题的研究价值

北京少数民族用于日常交际的语言虽然不同于各民族地区，但其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是相同的，北京各少数民族仍然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滋润着这个多元一体的中国语言文化。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可为保护中华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提供理论依据。

北京少数民族语言社区中的成员都与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与边疆少数民族语言社区中的人比较又有不同特点。尤其是那些来自民族地区的精英，能够引导民族语言的方向，同时也是本民族文化的排头兵，因为他们获得信息最快、最广，对各种文化的冲突、影响最直接，能够影响乃至决定整个民族文化的走向。北京是展现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一体的窗口，本课题可对研究中国的语言国情提供

重要的信息，并将为决策部门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一 北京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的历史沿革

北京有少数民族人口 585381（2000 年）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4.3%。超过万人的少数民族有 4 个，其中满族人口最多，为 250286 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42.75%；其次是回族 235837 人，占 40.29%；第三是蒙古族 37464 人，占 6.4%；第四是朝鲜族 20369 人，占 3.5%。北京市还有 11 个少数民族超过千人，他们是：土家族 8372 人，壮族 7322 人，苗族 5291 人，维吾尔族 3129 人，藏族 2920 人，彝族 1919 人，侗族 1616 人，白族 1554 人，锡伯族 1491 人，瑶族 1112 人，布依族 1035 人。^①

（一）北京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的形成

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有八百多年的建都史，其中历经封建王朝的 5 个朝代。辽、金、元、明、清有 4 个朝代是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辽代是契丹贵族统治。金代是女真人统治，女真人将燕京改名为中都，于 1153 年正式建立了金朝国都，从此，北京就成为一代王朝的正式首都。女真人是满族的先人，元代王朝是蒙古族世居统治，清代王朝是满族统治。中国少数民族营建大一统王朝的只有蒙古族和满族。少数民族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中，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北京的满族及蒙古族世居社区是在满族人及蒙古人部分迁移京城并聚居生活而形成的。以密云县檀营满族蒙古族乡为例。檀营原是清朝满、蒙八旗兵的驻防营地。八旗官兵携眷驻防，逐渐形成民族聚居村落。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身世讳莫如深。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公开了民族成分，获得民族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民族尊严。先是 1957 年，北京市成立了六个

^① 见马中璞：《浅析北京的少数民族及其民族工作》，《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 年 9 月。

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转山子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长哨营满族乡、东黄梁满族乡和檀营满族蒙古族乡。但第二年成立人民公社，这些满族乡统统被撤销。1983年8月26日，檀营满族蒙古族乡成立（实为恢复），随后成立了喇叭沟门满族乡和长哨营满族乡。

回族在北京形成聚居区具有不同于满族和蒙古族的原因。13世纪初成吉思汗大举西征，在战乱中，中亚和西亚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向东迁徙，还有一些穆斯林青壮年被编入成吉思汗的军队。忽必烈建立元王朝后，于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诏令来自西域的穆斯林军士在中国落户。穆斯林就是自那时起开始大规模定居现今北京的。回族一般是围寺而居。清真寺一方面是穆斯林信教的宗教场所；另一方面，是回族人的生活需要，如出生、婚姻、死亡等民俗活动都离不开清真寺。清真寺大小与回族居住人口多少成正比。围绕着清真寺就形成了一个回族聚居区。北京市有回族聚居比较多的乡2个，村50个，街道9个，社区居委会13个，共有大小清真寺69座，其中牛街清真寺规模最大，居住的回族有1万余人。

北京市的四个万人以上少数民族中，只有朝鲜族没有聚居区，朝鲜族的居住格局一直是与其他民族杂居。朝鲜族大部分居住在海淀区魏公村、中关村和朝阳区和平里一带，这两个区的人口占全市的58%，丰台区、昌平区居住的朝鲜族也分别达到千人以上。

（二）北京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的发展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近三十年中是北京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少数民族社区中的大多数成员是国家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社区成员基本都是只拿固定的经济收入，加上城市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无论基于何种原因，人口在社区的自由迁出、迁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客观上促成了社区人口的继续聚居状况。



与此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许多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工作单位和宿舍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少数民族聚居社区。这些社区的成员和当时其他社区成员一样，隶属于某一个国有或集体企事业单位，居住在这些企事业单位建造的居住区内，稳定的工作性质和收入使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社区在几十年中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三）北京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的现状

对聚居状况直接造成冲击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的北京市危旧房改造工程。一些少数民族的世居社区成为北京市重点危改区。比如对回族聚居区牛街的改造。因为牛街是北京城内最大的回族聚居区，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古迹，是体现民族政策的窗口，地方政府在推动牛街危改的过程中，把居民回迁作为向开发公司招标的前提条件，实行了“鼓励外迁、允许回迁、实行房改”的政策。虽然如此，危改拆迁工程还是促成了牛街聚居区的变化。首先，一部分无经济能力购房回迁者不得不离开牛街被一次性安排到其他地区居住；其次，回迁安置是回汉杂居；第三，从平房大杂院居住改变为单门独户的楼房公寓居住形式，会减少邻里间的互动机会和彼此之间的联系。以上因素似乎促使了原有社区一定程度上的瓦解。

在这一阶段，由工作单位形成的社区也有所变化。所有制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社会生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职工对单位的依赖性趋于弱化，广大职工开始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人的平面流动增加了。再加上后来推行的住房制度改革，公有住房的出售，商品房的大量上市，促成外来人口的涌入及社区成员的搬出，这些因素使原来形成的固定不变的语言社区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二 北京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的类型特征

根据形成及居住特点，可将北京少数民族语言社区分为三

种类型：

第一种：世居的少数民族语言社区

北京的少数民族中居住人口超过万人的有四个，其中回族、满族和蒙古族都有各自的以街道、乡村为单位的聚居社区。城区有：回族聚居的宣武区牛街社区和马甸回族社区，满族聚居的海淀区蓝靛厂火器营社区是北京城区目前仅存的一处满族聚居区。还有一些郊区、县的少数民族聚居社区，如朝阳区的长营回族乡，通州区的于家务回族乡，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怀柔区长哨营满族乡，密云县檀营满族蒙古族乡。门头村是北京市唯一的有祖居苗族居住的村落，也是海淀区唯一的民族村。全市共有109个民族村。

这些世居的少数民族社区，有着不同的民族建筑、民族文字、民族饮食、民族风俗、民族节庆、民族歌舞和宗教文化，这些与其民族语言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例如回族聚居的牛街社区，处处可见独特的民族风情：回族宗教活动的职能中心——牛街礼拜寺位于牛街的中心，以及与之和谐的白色的穆斯林风格的建筑，还有在穆斯林宅院门楣上悬着的“经字堵阿”，即一种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横牌，上写吉祥祝福之语或赞颂真主、穆圣的祝词，晨曦之中礼拜寺的阿訇登上唤礼楼（邦克楼）用阿拉伯语高声呼唤居住在周围的穆斯林进行当日的第一次礼拜。

在语言使用上，尽管有些民族已经转用汉语，例如回族、满族，但这些少数民族形成的语言社区仍然具有不同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的特点，他们使用的语言包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表现在他们使用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尤其是词汇上，有许多带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词语。这些语言社区的成员，由于世代生活在一个社区内，形成了类似于农村社区中人们之间的深厚情感，以及对社区的乡土般的热爱，加之他们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社区的凝聚力强于下述两种语言社区。

第二种：少数民族工作单位语言社区

北京具有少数民族工作性质的工作单位分布在社会各个领



域,例如:新闻出版单位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中心、民族出版社、中央民族语文翻译中心以及各种民族杂志社;企业有中国民族经济开发总公司、民族印刷厂;教育系统有民族大学、民族中学、民族小学、幼儿园若干所;旅游业有北京民族饭店、中华民族文化园;卫生系统有北京民族医院;文化系统有北京民族文化交流中心;民族艺术方面有中央民族歌舞团等等。

这些少数民族单位及其职工的宿舍区形成了特殊的少数民族语言社区。这些社区中的成员之间都是同事,除了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比如藏学研究中心)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多民族混杂、杂居。大家来自于不同的民族,由于工作的原因聚集在一个单位,虽然不像世居的少数民族社区的成员那样对社区有类似于农村居民对乡村的深厚感情,但也把单位和社区看成自己的家,这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全民所有体制把职工固定在一个工作单位,一旦进入某个单位,一般情况下就终生在这个单位工作。所以,工作单位少数民族语言社区虽然是多民族组成的,但处处表现出各成员之间的团结友好,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缩影。在语言使用上,和本民族人交谈时一般用本民族语,和其他民族人交谈时用汉语普通话。

第三种:具有流动性的少数民族语言社区

具有流动性的少数民族语言社区主要是指学生在校上学形成的语言社区以及经商人员聚居形成的语言社区。每年都有大批少数民族中的佼佼者考入北京上学,组成具有流动性的少数民族语言社区。因为学校是他们暂时的居所,几年之后当他们学成毕业,就会离开学校。然后,又会有新的成员进入学校学习。因此,在校生形成的语言社区具有流动性。北京市现有民族中学10所,民族小学43所,民族幼儿园31所,16所大学中设有民族班,还有一所民办的北京民族大学,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最高学府中央民族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少数民族青壮年走出偏僻的民族村寨,纷纷涌入城市,从事经商、务工等活动,形成一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大军。这些进城经商、务工的少数民族人员组成另一种

流动性的少数民族语言社区。他们在北京也曾形成一定的集中地，经营也达到一定规模，例如甘家口、魏公村的“新疆村”、“新疆街”等。

这些流动性的少数民族语言社区中的成员，一方面保持浓厚的本民族文化传统，最直接、最频繁地与当地文化接触碰撞；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与同一城市的同民族成员和本民族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城市中的其他民族成员也有广泛的联系，他们之间互相传递的不仅仅限于经济信息，还互相传递着包括民族关系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这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具有流动性的少数民族语言社区。

除了以上三种社区形式外，北京地区的大部分少数民族以散居的形式居住在城市的各个社区，他们的母语除了在特殊场合下使用外，大部分时间在家庭环境中使用，实际上形成了小的语言使用场合即家庭语言环境，但这个语言环境是否运行则取决于该家庭全体成员尤其是家长的语言观及文化观的开放程度。

三 结语：北京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的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已处于信息化时代，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距离正在一步步缩短。我国的经济建设和产业化建设速度将大幅度提高，随之而来，56个民族的通用语言——汉语的运用范围也将越来越广，仅在各民族内部使用的民族语言的实用性会相对减少。社区内小聚居空间将越来越小，大杂居空间将扩大，随着社区内人口的经济条件、居住环境的变化，其文化生活、语言使用都将有大的变化。但是在北京工作、学习、生活的少数民族语言社区中的人们，这些来自各个民族地区的佼佼者，他们自小生长的生活和文化氛围，已经像根一样深深地扎在他们的心田，他们中有许多还有着宗教信仰和特有的生活习惯。因此，他们的民族意识以及对母语的深厚感情是不会改变的。这就决定着北京少数民族语言社区将会长期存在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改变。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传斌、马雪峰. 都市回族社会结构的范式问题探讨——以北京回族社区的结构变迁为例. 回族研究, 2004 (3)

杜艳红. 大学生言语社区特色探究. 修辞学习, 1998 (5)

刘 军. 论少数民族对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2 (4)

良警宇. 从封闭到开放: 城市回族聚居区的变迁模式.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1)

沈立邦. 北京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 北京党史, 2003 (1)

谭新生、倪洁. 北京通史简编.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金启琮. 北京郊区的满族.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89

杨 青. 从居住环境的变化看民族凝聚力.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6)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世居社区语言与家庭语言	1
第一节 檀营满族蒙古族乡满族语言调查分析	1
第二节 檀营满族蒙古族乡蒙古族语言调查分析	22
第三节 于家务回族乡回族语言调查分析	33
第四节 牛街回族语言调查分析	50
第二章 单位社区语言与家庭语言	65
第一节 蒙古族社区与家庭语言调查分析	65
第二节 维吾尔族社区与家庭语言调查分析	86
第三节 哈萨克族社区与家庭语言调查分析	117
第四节 朝鲜族社区与家庭语言调查分析	140
第五节 藏族社区与家庭语言调查分析	161
第三章 散居社区语言与家庭语言	182
第一节 壮族社区与家庭语言调查分析	182
第二节 彝族社区与家庭语言调查分析	206
第三节 白族社区与家庭语言调查分析	231
第四节 苗族社区与家庭语言调查分析	249
第五节 锡伯族社区与家庭语言调查分析	268